

古史考

第九卷

民间论三代

海南出版社

古史考

第九卷

民间论三代

海南出版社

2003 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史考/吴锐等编.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11

ISBN 7-5443-1150-3

I. 古… II. 吴… III. 中国—上古史—文集

IV. K2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836 号

《古史考》第九卷 民间论三代

编 者: 吴 锐

责任编辑: 野 夫

出 版: 海南出版社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邮购: 100005 北京市东单邮局 69 号信箱北京新潮社文化交流公司

010-65135806 13681522126

<http://www.zgzj.org/gushikao.htm>

E-mail: xinchaoche2003@yahoo.com.cn

印 刷: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9.56

字 数: 775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ISBN 7-5443-1150-3/K.95

(全九卷) 定价: 1008 元

(Vol.1-9) \$450.0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北京新潮社文化交流公司调换

《古史考》编委会

主 编

彭振坤（湖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副 主 编

冉先福（湖北民族学院党委副书记）

谭志松（湖北民族学院副院长）

张永高（湖北民族学院副院长）

王新勇（湖北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

执行编辑

吴 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编 委

彭振坤	冉先福	谭志松	张永高
吴吉炎	郑东艳	王新勇	张芳德
张宏树	陈发喜	高雁军	张升辉
郑学刚	雷 翔	杨光宗	顿祖义
谭国玺	袁艳梅	蔡清万	曹 玲
徐定辉	邓辉煌	王飞霞	谭庆刚
石华富	向吉贤	冯 俐	赖申昊

目 录

特 稿

略谈刘起釪氏的经学、史学著作·····	饶宗颐 (i)
---------------------	---------

上编 面对面的对话

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 2001 年 ·····	陈星灿 刘莉 (1)
二 面对面的对话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 2002 年 5 月 24 日 ·····	张立东 (23)
三 寻逝岁流年 续学术长河 ——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公布后的反响 2003 年 ·····	李维明 (31)
四 有关夏代年代和夏文化测年的几点看法 2001 年 ·····	刘 绪 (49)
五 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高科技”基础 2002 年 ·····	蒋祖棣 (51)
六 李学勤等美国之行的反澄清 2002 年 ·····	蒋祖棣 (59)
七 无需读书便能潇洒地“走出疑古时代”？ ——评徐良高《〈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辩难》2002 年 ·····	蒋祖棣 (65)
八 夏商周年代不能以“钦定”方式强力推销 2002 年 ·····	许倬云 (73)
九 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 ——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 2002 年 ·····	蒋祖棣 (75)
一〇 读《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 阶段成果报告(简本)》2002 年 ·····	成家彻郎 (95)
一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年代献疑 2002 年 ·····	周 言 (105)
一二 怀疑真古，相信假古 ——夏商周断代工程基本思路质疑 2002 年 ·····	何炳棣 刘雨 (123)
一三 三析《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的研究脉络 2002 年 ·····	董 琦 (145)

- 一四 学风濯濯 学史昭昭
——关于“新砦期”论证(六题)2002年李维明(159)
- 一五 再论偃师商城是不准确的界标
——兼答方酉生先生 2003年刘 绪(213)
- 一六 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 2002年陈 淳(225)

中编 当前文明起源研究的虚骄之风

- 一七 评当前文明起源研究的虚骄之风
——序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2001年刘起釭(239)
- 一八 古史辨运动与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 2003年王新勇(281)
- 一九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 2001年袁 征(295)
- 二〇 如何正确理解“层累造史”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李锦全(305)
- 二一 对信古、疑古、释古说的重新认识 2001年张 越(313)
- 二二 重新认识古书辨疑 2002年12月24日熊铁基(321)
- 二三 我看顾颉刚的“疑古”2002年叶林生(325)
- 二四 我看古代传说的“质素、核心”2002年叶林生(337)
- 二五 历史是怎样造作出来的?
——初期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民俗研究 2003年竹元规人(353)

下编 克服影响创新的文化障碍

- 二六 克服影响创新的文化障碍 2002年9月20日李鸿志(365)
- 二七 科学创新离不开解放思想 2002年6月14日秦伯益(367)
- 二八 清除浮躁之风,倡导科学道德 2002年4月10日邹承鲁(369)
- 二九 主编瘾和广告热 2001年4月25日王曾瑜(377)
- 三〇 空头主编满天飞
——《煞风景的考证之一》的续貂 2002年王曾瑜(381)
- 三一 读李学勤主编之《标点本十三经注疏》2002年野间文史(383)
- 三二 评李学勤《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2003年谢 济(409)
- 三三 评袁锡圭《评〈殷虚卜辞综述〉》2003年谢 济(423)
- 三四 伪科学的来源和学者的辨伪使命 2001年

.....	王宁 邹晓丽 王海葵(443)
三五 论民族主义 2001 年	以塞亚·伯林(451)
三六 自由并非强权恩赐而来	
——回答何家栋先生的批评 2001 年	王小东(467)
三七 对于“民族融合”话语环境的反思 2002 年	麻 阳(473)
三八 金谷治前辈来信	金谷治(489)
三九 关于《甲骨文合集补编》李学勤序的郑重声明 2003 年 3 月 15 日	
.....	谢 济(491)

· 附录一 ·

一 地下材料也需要辨伪	
——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十 2003 年	吴 锐(493)
二 评对夏史“文献史料没有太多好探讨”说	
——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十一 2001 年	吴 锐(505)
三 《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辨伪一则	
——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十二 2001 年	吴 锐(535)
四 “特别的机会”与“取材困难”说辨伪	
——学习第十三批判笔记之十三 2003 年	吴 锐(543)

· 附录二 ·

- 一 继续征求著作权人和继承人 (30)
- 二 中国古典学研究动态
 - (一) “王献唐研究”项目成立 (104)
 - (二) 古文献信息处理技术——方正超大字库及输入法
..... (122、158、212、238、320、336)
 - (三) 吴锐《中国思想的起源》于2003年9月出版
..... (380、408)
 - (四)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即将出版 (422)
 - (五) 顾颉刚等编著《古史辨》将出16开横排新版 (422)
 - (六) 《中国古典学》将创刊 (450、472、488)
 - (七) 《四库家藏》将于2004年1月出版 (534)

《古史考》第五至九卷凡例

- 一、第五至八卷收录1949—2000年之间的文章，第九卷收录2001—2003年之间的文章，绝大部分是转载已经发表过的。
- 二、目录中文章标题后的年月日是指文章最初的发表时间。文章编排的顺序大致按发表时间的先后，兼顾内容类别。
- 三、除个别文章外（如第七卷池田知久文），（）前面的字表示是《古史考》编者判断的错字，（）里的字是《古史考》编者改正的字。
- 四、《古史考》所有文章的标题均位于奇数页，为了减少空页，一些偶数页的行距进行了压缩。

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网上讨论纪实*

陈 星 灿

刘 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 北京 100710)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LaTrobe University, 澳大利亚)

一、引 子

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工程”)结项前后,因《远东经济评论》(以下简称《评论》,2000年7月20日)和《纽约时报》(以下简称《时报》,2000年11月10)上关于“工程”的两篇文章,引发了一场网上大讨论^①。参与讨论的人数虽不算众,但涉及的问题很多。鉴于国内学者几乎没有参与这场讨论,辩论的语言又是英文,国内学者了解起来不很方便,所以有必要把讨论的主要内容撮要公布,以备关心这些问题的学者参考。

二、断代工程是民族主义吗——报纸上的反应

先从《评论》的文章说起。这篇署名 Bruce Gilley 的文章题为《中国:民族主义》。标题下的点题文字如次:“发掘未来——一项旨在证明传说中(mysterious)的夏王朝——有人相信它是中国最初的文明——存在的考古项目,为中国具有潜在危险形式的民族主义提供了给养。”该文认为这项耗资巨大的国家项目似乎并没有结束夏朝是否存在的争论,相反,它引用评论家的话说“工程”因北京推动民族主义的企图而兴,其结果是令发现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它还提到,外国考古学家不能参加工程,是因为他们像官方所说的那样,是夏王朝的最大怀

* 原载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9期,2001年6月。

① eaan@ccat.sas.upenn.edu

疑者。不仅如此，国内一些对夏持怀疑态度的学者，甚至对夏的疆域和王名试图提出质疑的学者，在经过一系列的“工作报告”（work report）会议以后，也销声匿迹了。文章引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长颜娟英的话说：“工程存在许多问题，因为其动机在于夸耀中华民族（to glorify the Chinese nation）。”“它主要是一个政治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工程。”文章作者认为“工程”对未来具有意味深长的意义。它说分析家担心“工程”可能会给中国不断升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火上浇油（provide volatile new fuel to a growing fire of ethnocentric nationalism in China），其结果也许会导致（中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诸问题上具有更加挑衅姿态的外交政策（could result in a more belligerent foreign-policy stance on issues such as Taiwan and China's leadership role in Asia）。它甚至认为，把夏作为中国“神圣”历史（sacred past）证据的声明，是三十年代日本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用吹嘘自己历史为战争造势的回声。香港科技大学的政治科学家 Barry Sautman 对此有简短的评述：“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推进这样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又说，“我认为‘工程’更像是一件坏事而非好事。”另外一个不具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西方著名学者，这样评论断代工程，“底线是人们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现在的中国愿意相信夏王朝（的存在）。”“中国历史传统的真实性中有巨大的感情投资，那就是相信中国是最伟大的、最古老的和最辉煌的民族（There is a tremendous emotional investment in the truth of a Chinese historical tradition in which China is the grandest, oldest and most glorious of nations）。”文章还对中国政府如何应用“工程”的结果表示担心：“现在预言（工程的）报告如何被政治利用还太早，但是夏的神话已经成为中国正在浮起的民族神话的有力部分。比如，去年为纪念大禹而建造的浙江省的大禹陵，就被用来吸引据说也是大禹后裔的台湾人，北京希望以此促进两岸统一。事实上，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措辞越来越建筑在（两岸）同宗同种而非领土完整的信念上（Indeed, Beijing's rhetoric on the Taiwan issue is increasingly grounded in notions on shared ethnicity rather than territorial integrity）。”该文还说，分析家担心“民族神话的潮水，将盖过中国试图将其融入新的全球文化和价值世界的努力。中国在亚洲的作用，尤其是它与曾经是其附属国的泰国、缅甸和越南的关系，也同样会被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所侵（浸）染，从而引起摩擦和终止合作。最后，致命的民族主义可能导致中国的自我毁灭，就像日本曾经经历过的那样。”文章最后引用 Barry Sautman 的话说“有许多人相信，如果中国把自己视为高等民族（superior nation），它便不能维系（survive）。”“很多东西取决于将来的中国领导人是否继续通过这种意味的中国人（的寻根）去寻找其合法性（A lot will depend on whether future Chinese leaders continue to seek legitimacy through this sense

of Chineseness)。”

《时报》的文章，是在中国公布“工程”结果的第二天发表的。这篇署名 Erik Eckholm 的文章，题为《中国，古代历史引发现代怀疑》。标题下的点题文字是这样的：“河南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二里头在新的报告中被学者们说成是鲜为人知的夏朝的都城。这个报告引起了民族主义在学术中扮演地位的质疑。”文章说，尽管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说“工程”得出了迄今为止最可靠的三代纪年，最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 4000 年前，多学科合作带来许多新的发现，但是，国内外学者对“工程”都有疑问。“他们说工程的作者们，受政治驱动去证明中国文化的原初性和独特性，试图跨越缓慢而又不可预测的科学研究 (But the project has been questioned by other scholars, here and abroad, who say its authors, driven by a political urge to document Chinese culture's primacy and uniqueness, have tried to leapfrog the slow, disorderly march of science.)。‘工程’参与者否认由他人来告之他们何为结论，但是评论家说他们有时被迫做出一个共同认识的假象 (Project researchers resolutely deny anyone told them what to find, but critics say they have forced an illusion of consensus in some cases.)。”文章引用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的话说：“有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企图把 (中国) 历史记载前推到公元前三千纪，中国推到和埃及一样的水平上。”“这与其说是学术上的冲动，还不如说更是一种政治上的和民族主义的冲动。”

文章提到，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同“工程”的领导人存在争论或拒绝参与，但是李学勤和其他领导却断然肯定“工程”结论的取得是采取了公正和慎重的“学术民主”的形式。文章还提到，武王伐商的年代非常关键，但是国内外都对“工程”采取的公元前 1046 的说法持有怀疑。上海交通大学的天文学家江晓原虽然对他自己的研究结果没有被工程采纳感到遗憾，但是也承认工程提供的资金和现代设备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文章引用另一位学者，美国斯坦福大学汉学家尼德炜教授 (David S. Nivison) 的话，说他信任的伐商年代是公元前 1040 年，他因为报告没有采用他送交“工程”的研究成果而盛怒 (outraged)。他还说，“不管谁正确，现在坚持唯一年代的做法在学术上是不忠实的 (intellectually dishonest)。”“那将是一团糟”。尼教授还补充说国际学术界会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 (tear the report “to pieces”)。因为“这些年代将被看作是由中国政府宣布为正确的年代，处在这种情景下的中国政府因而可能长期地毒害学术 (研究) (These are going to be seen as the dates pronounced to be correc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o be in this position may poison scholarship for generations)。”文章最后以李学勤的意见结尾，即他相信，“工程”报告是目前所能取得的最好成果，但这不意味今后没有

更进一步的突破。”

《评论》的文章发表之后，英文《中国日报》有一篇署名黄清（译音）的文章（2000年8月7日），率先对“工程”系民族主义的说法作出反应。文章指出，民族主义是讨论的中心（*theme*）也是靶子（*target*），它说作者试图制造恐惧并为他人的嫉妒（或可能更多的其他东西）提供发泄的靶子。文章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珍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为自己的文化遗产而骄傲。来到美国费城旅游的人都会鼓励不要错过“自由火炬”（*Lights of Liberty*），市长介绍这是游客的必须，我们可以理解这是民族骄傲的合法表示。为什么中国学术界研究自身古代历史的努力，可能会给“中国不断升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火上浇油”。文章认为这是典型的双重逻辑：“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被认为是危险的？只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感兴趣？”它的回答是：“显然不是。”

三、断代工程是民族主义吗——网上的讨论

11月13日，英国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历史系的 Christopher Cullen 博士发表意见，说他刚看到《中国日报》上的文章，“作为针对近来对三代工程及其他（事情）的政治意义夸大其辞的评论的反应，我不得不说这看来是并非不合理的（I have to say that it seems a not unreasonable reaction to some recent rather overblown comments on 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Sandai project and other matters）。我并不认为官方支持信仰夏朝（的存在），会是武力取得台湾或是扣押（*seizure*）俄罗斯太平洋滨海地区或是对澎湖列岛采取更咄咄逼人姿态的前奏。如果任何一种事情确实发生，那只能是基于更直接的现实和对成本效益的理解（*perceptions of costs and benefits*）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不管二里头文化是什么，它的确是早期中国文化（*Chinese ensemble*）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一种文化，它位于历史时期中国的中心地带，中国的任何邻邦都不可能以此为借口说中国威胁到他们今天的政治存在和利益。某些中国学者把二里头作为夏的做法是令我们难以接受（*excessive*）甚至是误导的（*misguided*），但是所有的文化都珍视自己的形象（*self-image*），这其中就包括某些似乎是被歪曲的历史（*slanted history*）。美国是这样，过去的英国也是如此。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李润权博士在次日的讨论中，就“工程”的背景和既有的讨论发表了很长的意见。首先他肯定尽管“工程”肇始于宋建的提议，但是参加工程的科学家都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即使在参与者中间对于年代等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这正说明中国学术界的健康发展。他还提到工程的结题报告专门指出，目前的结论是基于现有资料基础上所得到的最合适的结论，但它并不意味着研究和

探索就此停止。他说就他看到的对于“工程”领导者的压力，是参与者沿着自己的思路独立地进行研究，如果这样的研究不能使结论吻合该怎么办？但结果是大部分的结论是吻合的。至于说到工程是否为民族主义所驱动，他认为固然“工程”因宋建的访问埃及而起，但是正如某些同行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有某种程度的耿耿于怀（obsession）。如果（中国）在教课书上有一个一致的历史年代，那又何妨？他特别强调，在我们对“工程”发表意见之前，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它。在作出自己的判断之前，首先要把工程已经和即将发表的大量研究成果逐个阅读。从这种意义上说，《时报》和《远东评论》上的文章因偏见（on their biased opinions）而令人不快（offending）。他还认为两文引用中国同行的谈话如果不是不真实的，那也至少是断章取义的。

曾在中国考古的美国考古学家 Jim Railey 博士（TRC Mariah Associates, Inc）也在同日发表了长篇评论。他说他在中国累计住了近三年，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在山西垣曲待过一年。他个人的研究是垣曲盆地的新石器和早期青铜时代的社会政治演进，相对于参加讨论的某些学者只是根据文字和个别会议或者一两次对中国的访问来说，他坦言自己不仅有权权威谈论被意识形态驱动的当代中国考古学，还可以对二里头文化的社会演化状态作权威评述。他说至少就他认识的中国考古学家来说，二里头就是一个国家，也就是夏。对大多数中国考古学家说来，这种信仰不需要“干部”（关于“干部”或“上面”的讨论见下）给予暗示（nudging）。其中坚定不移的信念——尽管考古学的证据有足够的论辩余地——植根于根深蒂固的视夏代为历史真实的文化需要。他还说这是基于珍视国家和民族认同的考虑。被扭曲的台湾和西藏历史也包括其中，尽管明显更具现代意味。二里头国家问题就是源于这种对夏根深蒂固的信仰。这个问题在过去十年因中国与西方在文化方面的日益紧张和日趋剧烈的（危险的）民族主义的浪潮席卷中国而趋恶化。“这种状态决非自上而下的施压所致，尽管中国政府当然不会放过任何推动爱国情绪的机会，即使是对资金短缺的考古学家也复如此。”

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对中国学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抱持原谅态度的学者（原谅主义者 apologists）进行了批评。“我不能同意我们原谅这些东西，仅仅因为同样的事情可能在古罗马和纳粹德国也发生过。”对于任何考古学家来说，不管来自哪里，也不管来自何种文化，向意识形态投降都是对科学的破坏。中国与古罗马和纳粹德国的区别，仅在于后者已经成为历史，而前者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夏可能确实是历史的真实，二里头（夏或者非夏）可能是一个国家，但是证据远非清楚。他从考古证据出发认为二里头不是国家社会，又对刘莉视二里头为国家社会的回答发表意见（见下）。他说，刘莉抱持二里头是国家社会的观点是不幸的，她和大多数中国学者一样，很难从意识形态信仰和文化及政治系统灌输给他们的民族和历史认同中摆脱出来（shaking loose from the deeply-held ideological

beliefs and sense of ethnic and historical identity that their culture and political system have instilled in them)。这从心理学的角度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不应该让文化灌输的意识形态对好的科学研究起障碍作用（culturally-in-stilled ideology should by no means get in the way of doing good science）；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的中国同行开始解释像二里头这样一些重要遗址的意义时所发生的。他还说中国考古学对他来说像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只要新闻与中国无关，报道就客观；一旦涉及到台湾和西藏问题，报道就成了刺耳的咒语（resorts to an shrill,emotionally-charged mantra）。“很不幸，夏和二里头就是中国考古学的台湾和西藏（问题）的翻版。结果是使开诚布公和互利的对话同样成为悲剧（The results are equally tragic for the cause of open,informed discourse）。”在这篇讨论文字的开始和终结，作者都是以那个揭穿皇帝新衣谎言的小孩身份出现的，他说，“请原谅我充当那个敢于说真话的无知的男孩的角色。”

对此 Christopher Cullen 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1月14日）。他不承认自己是所谓的“原谅”主义者，但他提倡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合适的态度是积极对话，直到某一方撕破脸皮为止，对话双方必须互相尊重，而非基于这样一种基础，即让人觉得每一个西方学者都有权居高临下地集体痛斥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的学者（patronise and berate collectively the intellectuals of a quarters of the human race）。他还指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处处存在，任何地方都不例外。其中之一就是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One of the ideological biases that tends to inflict dwellers in large and (for this historical moment) self-confident societies is the conviction that those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are not the same as folks at home must ipso facto be threatening and wrong-headed to the degree that they are different），所以那些虔诚的穆斯林就一定是“原教旨主义者”；用传统方式思考其文化认同的中国人民就一定是被“日趋剧烈的（危险的）民族主义的浪潮（席卷）（‘washed over’ by an ‘intensifying (and alarming) sense’ of nationalism）”。

同一天 Colonge 东亚美术馆的 Lukas Nickel 回应了 Cullen 的意见。他说很感谢 Cullen 指出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他认为这场讨论的前提错了，这个前提即相信有“干部”（为工程）设定结论（postulating certain results）。“在我看来，中国人的研究通常会被对古籍的迷信所驱动。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怀疑夏朝的存在是不可理喻的，因为古籍对此确有记载而且夏鼐也相信它的存在。因此其目标仅仅是通过寻找考古学的证据去展示这个信仰。”他还认为，官方确有把中国历史向前推的兴趣，但是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威胁（There is no need of threat）。不管如何，寻找年代共识的研究不会危害任何人，如果只是为了统一课本的需要。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焦天龙在 11 月 15 日参加了讨论。他说如果你真对民族主义与考古学的关系问题有学术（他特别强调学术）上的兴趣，他可以推荐两本讨论中东和普通理论问题的专著（*Archaeology under Fire: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Heritage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Middle East*, Edited by Lynn Meskell. Routledge, 1998. *Nationalism, Politics, 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 Edited by Philip L. Kohl and Clare Fawce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如果你特别想“抽打”（beat）中国人或其他“东方人”，可以有一系列的文章可以参看（*Antiquity* vol. 73, No. 281, 1999）。如果你对“西方人”的民族主义“无知”（clueless），也可以阅读下列的著作：1. Michael Dietler, “Our Ancestors the Gauls: Archaeology, Ethn nationalism,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Celtic Identity in Modern Europ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96, No. 3, 1994, pp. 584-605. 2. Inga Lundstrom, “Reflections on an Unreflected Sphere: Archaeological Exhibitions and Nationalism”. *Current Swedish Archaeology*, Vol. 6, 1998, pp. 143-151.）。他在列出书目之外，质问“对那些认同你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界限到底在哪里？）没有一点问题的人们说来，你可曾知道现代世界还有一些人（包括考古学家）确实为他们自己的认同而伤脑筋”？如果你对此还是“无知”，那么让我告诉你在当代人类学文献中有一个词叫做“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我怀疑谁有权威充当这些人的“文化心理医生”（Cultural Psychiatrist）。

澳大利亚拉楚布大学考古系刘莉博士在 11 月 18 日，发表了网上讨论的看法。关于中国考古学的民族主义，她说，“我不赞成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用民族主义塑造的考古学研究方向（I do not support the use of nationalism to shap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rientations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urposes）”。这个问题可以参看她在英国《古物》杂志上发表的论文（“The Origins of Chinese Ancestral and Racial Myths”, *Antiquity* 73:602-613.）。她也不认为我们（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研究是纯粹客观的（value-free, 直译为“不含价值观”），因此没有必要让别人接受我们的价值观。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学者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研究。最后她还把与陈星灿合作的关于中国考古学与民族主义的论文提要附上，借以说明她的立场（“Archaeology of China”.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y*, ed. Tim Murray.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1）。

自由撰稿人杜仁（译音）在 11 月 20 日针对《评论》的文章和网上讨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或她）特别反感 Jim Railey 以“沾沾自喜的道德上的居高临下”（smug moral superiority）立场视中国考古学与“西方和日本”在学术标准上不能同日而语的看法（见后）。他也不能原谅一方面表扬“像西方和日本等地”（in places like the West and Japan）那样的高等级的学术标准，另一方面却是对

中国考古学家所谓受“文化灌输的意识形态”的指控。他说假如有一点常识，就会知道如果东亚真有一个国家出于政治—文化和宣传的目的把自己的历史往前推的话，那就是日本；最近日本考古学界发生的事情正说明了这一点。人们很难设想哪一个中国考古学家无论如何被“政治驱动”或者承受着与日本不能同日而语的学术标准之讥，会干出如此的欺天之事。

针对杜仁的反驳，Jim Railey 次日给予再反驳。他恳求不要误会他所说的“西方和日本”，他说那仅是指考古学的方法说的，就他所知，“中国大陆今日的考古学方法与美国三十年代的相仿佛。”（此点见后）至于“文化灌输的意识形态”云云，他说那也仅仅是指考古学的方法而非其他。他还指出，日本毫无疑问利用和歪曲历史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任何一个文化和国家或多或少也都这样干过。他再一次提及他本意只在考古学的方法上，但是杜仁显然把它扩大了。他劝杜仁在发动“歇斯底里的、感情冲动的反驳”（irrational, emotionally-charged）之前最好仔细阅读一下其他人的评论。

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工程”有没有来自上面的“指令”。Haun Saussy 在 11 月 12 日的讨论中这样说：“就我所听到的，工程具有强烈的导向性，工程承受着很大压力去迎合一个可能被以后用来宣布作为官方事实的共识；这在我看来不像是考古发现和研究的路子。（From what I hear, the project was heavily outcome-directed and pressured to come up with a consensus answer that might then be promulgated as the official truth; that doesn't sound to me like the way to discover and analyze antiquity.）”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的 Nathan Sivin 在次日的讨论中直言不讳：“让我感到奇怪的不是‘上面’（‘shangmian’ the cadres up there, above us ordinary mortals）在没有证据、以前也没有人这样做的（前提下）要把二里头当成夏；有意思的是他们把它视为一个王朝，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单一的世系和文明（的一切）。”（详见后）还说独立的外国考古学家，因为不会害怕“上面”翻动眼皮而跳起来，所以已经把他们的判断押在夏的文字出土等等上面。他还说他同参与项目的中国朋友谈过，他们中某些在研究所工作的研究人员因不能迎合“上面”的需要而受到威胁（threatened with decimation）。他说这些人都不相信夏的存在，但他们强调工程使人有事做，为他们的研究所增添电脑和网络设施等等，因此他认为是什么“驱动”了工程不言自明。这里应该提到，《评论》的报道也说过“资金缺乏的考古学家迅速接受了工程用以确保长期停滞的（考古）发掘的资金（Cash-starved archaeologists quickly took up the project as a way to secure funds for long-stalled digs）。”

但是也有人对此质疑。Christopher Cullen 在同日的讨论中问到：“我怀疑 Nathan Sivin 所说的‘干部’云云在怎样一种程度上能够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确实的概念，即在如三代工程这样的研究中是谁向中国学者施压？”他还问到：“我

几年以前看到的宋建并非身穿中山装，难道从技术上说他也是‘干部’吗？”同日 David Pankenier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他在中国参加过几次考古学和青铜时代历史的会议，他证明中国学者中间关于夏的历史真实性问题从二里头的宫殿基址发现之日起就非常激烈，这远远发生在断代工程开始之前。他还说 Nathan Sivin 的朋友可能属于一个阵营 (community)，而另外一个阵营也同样在考古圈有代表性。“我从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一方的意见，是基于来自什么地方的政治压力。中国学者能够而且确实在夏是否神话及什么才够称得上‘王朝’等等问题上各持己见。这些意见不必跟西方学者的吻合，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他们。”

Jim Railey 则认为中国考古学中的“干部”角色问题确实存在，尽管官方意识形态造成的后果 (effects of the official ideology) 比 Nathan Sivin 所言还要严重。他认为“工程”是意识形态干扰考古学研究最突出的例子 (one of the most glaring examples of an ideological bias intruding itself into an otherwise sober archaeological endeavor)。但他也承认，“很幸运没有看到意识形态的专制一定影响到考古资料本身，因而其他地方的中国研究专家 (如果不是我们的中国同行) 可以自由地对其提供不同的解释。”在此他特别推荐读者阅读 Robert Throp 教授发表在《早期中国》上的文章 (“*Erlitou and the Search for the Xia*”, *Early China*, Vol.16, 1991)，他说这大概是对夏——二里头问题研究最深入、最细心的一篇文章。在同一篇讨论中，他再次提到意识形态一般说来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同事获得 (COLLECT) 和描述 (DESCRIBE) 考古资料本身，而且考古学的方法也在慢慢进步，尽管与西方和日本这些地方的标准相距甚远。他还说不论如何，很高兴看到夏——二里头——国家问题的争论至少在中国之外仍有讨论的余地 (remains open)。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根据事实说话，并且坚持正确的理论 (to make sure we keep our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s straight)， “也许某一天证据会朝有利于中国 (学者) 的立场转移，到那时我会是最先改变立场的一个。”

四、夏朝是否存在

夏或夏朝是否存在，是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这里不得不提到《评论》的意见。文章认为，尽管因为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朝的存在，但是就夏来说，它一直都是传说范畴内的事。尽管夏被公元前二世纪的司马迁说起过，但是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他的说法。“这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痛点 (cultural sore point in China)，因为它意味着这个国家不能吹嘘自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它提到二里头遗址发掘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没有发现像商代甲骨卜辞那样的东西来证